

“开胸验肺”：事件未到了结时

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被曝光,引起当地党政、工会的重视,各方纷纷出面为他提供帮助,不仅确认了他的尘肺病,而且处分了一批在此事件中不作为的官员,算是有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结果。事情似乎可以了结了。然而,细加考察,却又远没有到了了结的时候。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张海超虽然被确诊尘肺病,但他“仍然无法获得工伤保险基金的赔付,因为(他所工作的)郑州市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并没有给他缴纳工伤保险费用。”这至少意味着两点:一是张海超拿着诊断证明无处讨要赔偿,他此前所做的一切

努力都可能“归零”。如此结果,无异“画饼充饥”;二是更多的“张海超”们一旦出现工伤,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在全国2.25亿农民工中,只有4942万人参加了工伤保险。就是说,有近八成的农民工如果发生工伤,是没有赔付保障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张海超无处讨要赔偿的事还有人管吗?即使有相关规定可能使他获得一定的补偿,但他作为农民工,却未见得明了其中的路径,谁来提供帮助呢?

在此之前,我们看到了多方领导的积极介入(尽管是在媒体曝光之后),但现在,却几乎没有谁再伸了手,至少未见相关报道。因

此,我们希望有关方面继续关注事件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当初做过某种承诺的部门、组织,不要止步于应急、应景。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张海超问题的彻底解决,而且还关系到有关方面的社会公信问题。

或许,张海超事件作为“特例”,在有关方面的强力干预下,最终会有一个圆满结果,但是,如果仅仅解决了一个张海超的问题,而没有从源头、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寻求彻底解决此类问题的途径,那么,今后难免还会出现王海超、李海超,出现更多的劳动争议、纠纷。

眼下就有一个实例。重庆媒体披露,2004年5月,在温州一矿石研磨厂打工的11名重

庆籍农民工,全部被诊断为矽肺病。5年过去了,经过漫长的诉讼、仲裁后,7位农民工在等待赔偿中去世。剩下的几名病情还在逐渐恶化,生命垂危,依然期待着赔偿。

问题出在哪里呢?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对用人单位和有关职能部门缺乏有效监管,同样不能忽视。职业病是慢性病,从受害到发病、确诊、索赔,从争议到仲裁、诉讼,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用人单位和职能部门完全拖得起,拖到人亡命息,大不了赔偿一点抚恤金,而那些钱甚至可能连丧葬费都不够。这就是农民工维权难的现实窘境。

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是农民工维权难

的典型案列,如果没有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依靠法律或制度有效程序的解决,则可能演变成“连续剧”。“开胸验肺”只是开始,“多方介入”有了转折,难获赔偿再起波澜,司法诉讼也非尾声,不知还会如何发展,如此漫长的维权之路上,张海超如何走下去?能不能走下去?结果又将怎样?都是未知数。

为了类似“开胸验肺”的悲剧不再发生,为了更多的职工兄弟不再奔波于漫漫维权路,有关各方是否应该再加把劲,从劳动用工、强制履约、完善法规、日常监管等多方面下手,寻求彻底解决职工群众维权难的问题呢?

惩治酒后驾车 当心“用力过猛”

□林琳

据8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查处酒后驾车,将完善部门联动机制——会同文明办等把酒后驾驶等与单位、个人评优评优挂钩,凡酒后驾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或醉酒驾驶的,实行“一票否决”;协调证监会、银监会等,与车辆保险费和银行个人诚信体系挂钩,凡酒后驾驶发生重大事故或醉酒驾驶的,提高车辆保险费率,纳入银行个人不良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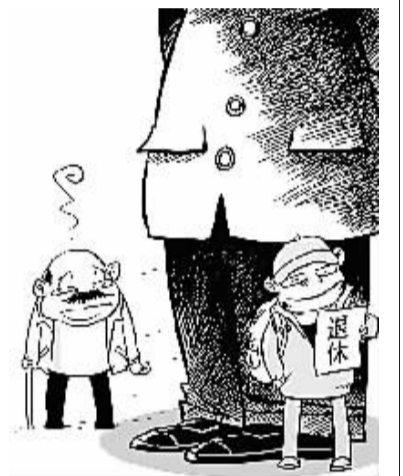
让有车一族有所顾忌,交管部门可谓煞费苦心,似乎恨不能把所有部门都调动起来。问题是,将个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与单位、车辆保险费、银行诚信体系绑定在一起,制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这么做合适吗?会不会“用力过猛”?

首先,关于与单位、个人评优评优挂钩。按照责任自负的法治原则,一人做事一人当,闯红灯肯定不是在单位闯的,酒也十有八九不是在单位喝的,喝酒未必是出于工作需要,开的也未必是公车,单位何错之有呢?没有过错,何来责任?

其次,关于与车辆保险费、银行诚信体系挂钩。目前来看,交强险就实行浮动费率,出了事故,下一年的保费就会提高,这一点无需再强调。而银行个人诚信体系,似乎联动得有些莫名其妙。银行为客户建立诚信体系是为了降低自己的经营风险,提高服务质量,只有客户违反了银行的相关规定,比如骗取贷款、贷款到期未还,银行才有权在其信用体系中留下记录。醉酒驾车触犯的是交通法规,与银行何干?更何况,醉驾者与银行有没有业务往来都是问题。

无论是评优评优一票否决,还是列入银行信用“黑名单”,都等于是正在制定的交通违法行为处罚之外,额外创设了新的处罚措施和手段,很可能会额外剥夺了当事人的荣誉权、名誉权以及财产权。而这种创设和剥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或依据。

不是想故意给交管部门欲推行的新政泼冷水,而是希望对类似试图捆绑、“株连”不相关的人和事,以期问题迅速解决的管理思维和模式,应有所警惕,三思而行。



背靠大树好乘凉

据《济南时报》报道,网友发帖称,山东省临邑县一位干部的亲属13岁便获得了当地电业公司的正式编制,24岁内退后继续按月领工资,收入比在岗职工还高。

尚未成年便开始领工资,工资还提高,这样的好事哪找去?地球人恐怕都心知肚明:谁家有个“好爸爸”呢?普通人家的孩子有这个福气吗?

8月12日,两则与GDP有关的新闻让人们看到了终结“GDP崇拜”的曙光。

一则是关于GDP核算机制。《人民日报》发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长的署名文章,表示下一阶段将研究国家统一核算省级GDP的实施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地区与国家GDP差距过大问题。

另一则关于干部考核机制。据《新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审议通过《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加重民意分,降低GDP比重”成为最大亮点。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晴雨表”,GDP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当下一些地方盲目追求GDP,进而形成了“GDP崇拜”症,热衷经济项目的大投入、大建设,甚至不惜牺牲环境保护、民生福祉为GDP让路。而统计数据“注水”,就是GDP崇拜的突出表现。

目前,我国GDP核算采取国家和地方独立核算机制,而非简单的加权汇总。从理论上讲,由于重复统计、统计资料来源和系数不一致等问题,国家和地区GDP存在一定的差距不可避免。问题是,这种核算误差长期超出合理范围,2004年,地方GDP之和高出全国核算数据19.3%。经过随后几年的低位运行,今年上半年,高出差率再次接近10%,地方GDP之

和高出全国约1.4万亿元。

鉴于国家统计局部门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地方GDP数据的水分成为人们质疑的焦点。专家指出,地方GDP数据“1+1>2”已不是统计技术层面的因素,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增长率,追求“政绩”、“形象”才是问题根源。近年来,尽管淡化GDP的呼声日渐高涨,但在现行体制下,无论是各级政府评价下级政府,还是地方官员在选拔中获得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GDP的总量、增长速度和排位,也就是所谓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过分崇拜GDP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京骂的后果

近日,一家外国公司的考察团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中超联赛,球场上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的京骂声浪,让懂中文的老外在震惊中离场——据报道,本已基本达成的合作意向因此而搁浅。

居然有人为京骂开脱:随着越来越普遍的流行,京骂已渐渐失去原义,成了一种强化语气、表示吃惊的语助词,在球场上“加油”的反义词——如此把恶俗当有趣,怪不得京骂大行其道。

以两大机制终结“GDP崇拜”

首先,GDP是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注水GDP不仅损害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还会直接导致一些人对当地经济走势的盲目乐观,进而影响决策层政策的制定和把握。目前,我国经济处于企稳回升的爬坡期,政策的不合理调整极有可能会危害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大局。

其次,GDP和所有统计指标一样具有局限性,生态环境、就业形势、收入分配状况等内容都很难体现。在GDP大棒指挥下,一些干部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唯拉GDP的工作才干,唯增长GDP的项目才上,而不愿花费

时间和精力沉下身来,做一些无关数据却关乎民生的事情,以致于在经济繁荣的表象下,老百姓并未得到多少真正的实惠。

值得欣慰的是,全国上下对GDP的认知正在呈现理性回归。今年上半年,山西公布“GDP全国唯一负增长”的统计数据,不仅赢得了国家统计局高层的褒奖,而且得到了社会舆论的理解。如今,省级GDP由全国统一核算,有望杜绝地方制造虚假政绩。而新的干部考核机制则有望从根本上消除某些人头脑中的GDP桎梏,使其放开手脚,更多地考虑地方发展实际和百姓现实需要,统揽全局开展工作。

□黄哲斐

鲁迅过时了?

据《成都商报》报道,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3篇。

有人因此疑惑:难道说鲁迅的作品真的过时了?其实,大可不必反应过激,语文教材应该让孩子学到更多风格的范文,汲取百家之长,如果总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纠缠,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那么教材改革的步伐如何迈出?

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藏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从1949年初起,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逐渐明晰和具体,并摆上了重要工作日程。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与来访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到解放西藏的问题。他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为了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完成祖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中共中央作出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建设西藏。

1949年8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在进军西北时,要为解决西藏问题作准备。随后,又根据具体情况,将进军西藏的战略任务主要赋予中共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9月26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作出三项庄严的保证,其中第一项就是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950年10月,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分裂势力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阴谋,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中共中央在决定进军西藏的同时,采取一系列举措,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因为,西藏如果能够实现和平解放,对于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持西藏社会的稳定是十分有利的。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都大力做争取工作。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抵达北京。经过一个月的谈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

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平解放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羁绊,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实现了藏族与全国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为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础。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对外公布了协议的全文,并报道了和平谈判的经过。《十七条协议》一公布,立即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同日,班禅大师及堪布会议厅全体人员发表声明,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6月1日,班禅致电毛主席,表示真诚拥护协议,为实现协议,为西藏民族永远地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获得解放和发展而努力。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主席,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根据协议规定,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克服重重困难,分别从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地向西藏进军。1951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抵达拉萨。9月9日是藏族的“雪顿节”,这一天,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支队进入拉萨市区,并举行了先遣支队入城仪式。10月24日,中共西藏工委、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进驻拉萨郊区。2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欢迎仪式在军乐队高奏国歌声中开始,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向进藏解放军致敬,献哈达。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五里红和毛泽东、朱德画像引导下,以军乐队、红旗队为先导,在《解放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威武雄壮地进入拉萨城区。西藏地方政府各级官员、三大寺的活佛、堪布、藏人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拉萨全城红旗招展,鼓号齐鸣,哈达纷飞,人山人海,人们争相目睹这一盛大的历史场

面。

实行民主改革,既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西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在西藏地区要进行民主改革。西藏民主改革的范围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目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

西藏和平解放时,中共中央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应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指出:“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必须是和平改革”,“西藏的民主改革,必须在充分做好准备工作,上层真正愿意改革的时候再去改,并且在改革中要坚决做到不出乱子和不出人命,否则宁可暂缓进行,而不要勉强进行。”同时,中央作出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敌视中国的外国反动势力的唆使和支持下,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他们一方面对中央虚与应付,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一面暗中与国外反华势力相勾结,加紧策划分裂祖国的活动,在西藏各地不时挑起局部武装叛乱,并加强其内部的统治和控制,极力巩固其罪恶的农奴制度。到1958年前后,西藏的局部叛乱逐步升级,严重威胁到西藏各族人民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对此,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和驻藏人民解放军一再采取克制和忍让态度,并寄希望于西藏地方政府承担起平息事态、制止叛乱的责任。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反其道而行之,由暗中支持武装叛乱逐步演变为公开支持并亲自组织武装叛乱。

1959年3月10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西藏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全面武装叛乱。3月20日,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进行平叛作战。3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撕毁了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发动西藏的全面叛乱。中央原来决定的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继续执行下去。”“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地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消除割裂分裂活动的根源。”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立即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

到1960年底,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了旧西藏严重的封建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和各种野蛮刑罚,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和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推动了西藏社会的巨大进步,给各阶层特别是劳动群众、百万农奴带来了巨大利益。百万翻身农奴更加热爱共产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以失败而告终,他们妄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的丑恶面目则暴露无遗。

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翻身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政权,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标志着西藏全面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从此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新中国档案

彭雪枫



彭雪枫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智勇双全,战功卓著,被毛泽东、朱德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

彭雪枫,1907年生,河南省镇平县人。1925年在北京育德中学读书时,参加“五卅”运动,当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北京汇文中学,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汇文中学支部书记,负责领导北京东城的学生运动。1927年春参加北京南苑农民暴动。后在北京、天津、烟台等地从事秘密革命活动。1930年初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5月被派到苏区,历任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纵队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江西军区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政治委员和中革军委第1局局长等职。参加了长沙、吉安、赣州、漳州、水口等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每次都担任攻坚任务,身先士卒,且多次担任先锋部队的指挥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革军委第1野战纵队第1梯队队长,红3军团第5师师长。1935年2月部队改编后任红3军团第13团团长。在攻克娄山关、遵义城的战斗中,率部担负主攻任务。9月任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到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4师政委

第29届全国最佳邮票评选揭晓

本报讯(记者马学礼)8月12日,第29届全国最佳邮票评选在宁夏银川揭晓。王虎鸣设计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邮票荣获“最佳邮票奖”,其小型张同时荣获“最佳邮票设计奖”;萧玉田的《颐和园》特种邮票,张艺谋、陈名杰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纪念》纪念邮票获得“优秀邮票奖”;北京邮票厂印制的《中国鸟》特种邮票获得“最佳邮票印刷奖”。

本届全国最佳邮票评选活动新增了网络投票,共收到网络选票14.66万张,选票总数共计30余万张。各类奖项由专家评审和群众投票产生。

人物检索:鲍伯扬,南京解放前夕出生,现年60岁。曾当过知青,工人,南京师范大学毕业,上世纪80年代初分配到江苏省总工会工作,担任过政策研究室科长、组织部副部长、民管部部长等职,现任副厅级干部。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回首新中国60年来的发展,我为祖国面貌日新月异感到自豪,为中国人昂首挺胸跻身世界民族之林而充满骄傲。

我和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我们这代人经历过和平建设发展的甜,也经历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折腾之苦,但更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

我的轨迹因改革开放而改变

成功发展道路。感谢改革开放给了我公平竞争、自主选择人生发展方式的更多机遇。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离开课堂、中断学业12年之后,还能上大学。从此,人生轨迹得以改变,我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机关干部。随着相关政策的调整,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过去对“臭老九”的政治歧视被破除,我和在大学任教的母亲都在1984年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我受到组织和领导的信任,很快被提拔重用;母亲被全校教职员工选为区人大代表。前些年,我的孩子从国外留学回国,

也选择了留在国内工作。我打心眼里拥护党的改革开放、科学发展政策,努力做实践者和参与者。我到江苏省总工会工作近30年,始终致力于探索发展职工民主管理、协调劳动关系,增强基层工会活力,努力促进企业发展、社会和谐,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积极为祖国的繁荣、进步和振兴添砖加瓦。(本报记者 王伟整理)

我和我的祖国

千余中国律师帮二战中国劳工索赔

本报讯(记者车辉)二战被劫华工欲向日企索赔,中国二战劳工法律援助团8月12日已向20家日企发出律师函,要求对方认罪道歉并赔偿,最低索赔2万美元。

中国二战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北京市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任邵建律师,法律援助团执行团长、山东鹏伟律师事务所付强律师,代表全国120家律所、1000多名中国律师,向20家日本加害中国劳工企业发出律师函,要求上述企业承

认侵害事实,派出代表就侵害认罪,并与法律援助团代表和中国二战劳工联谊会协商赔偿。任邵建表示,因中国劳工工资日本政府诉讼大门被关,对日索赔被迫寻求诉讼外手段解决索赔问题,而此手段核心是:要求每一个加害企业承认事实、谢罪、赔偿。“我们不差那几个小钱,但一定要他们赔罪、道歉。”中国被劫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二战劳工李良杰说。

